

我在《经济研究》发表处女作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晋川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杭州大学政治学系,后转入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至今,我学习、研究经济理论和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已经有40个年头了。《经济研究》在这40年中从未间断一直伴随着我的一本经济学杂志。在我的记忆中,《经济研究》1979年刊登的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理论的大讨论的一系列文章,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兴趣,并使我进入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就开始把《经济研究》作为专业学习必读的学术杂志。

1982年初,从杭州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经济思想史专业,在宋承先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当时的专业研究方向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也就是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我学习和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理论,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斯拉夫的经济理论。斯拉夫是意大利籍经济学家,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主要从事李嘉图全集的编撰工作,是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当时就多读了一些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著述,例如罗宾逊夫人、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的著作和论文,尤其是花了一番功夫读了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古典综合学派的“两个剑桥之争”的部分主要论战文章,对总量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有了一些知识积累,同时也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坦率地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学习期间,尽管我还是像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那样,坚持阅读每一期新近出版的《经济研究》,也仍然对《经济研究》杂志保持着从本科生时期就有的那份崇高的敬意,但心底也开始滋

生出一丝丝的不满,觉得《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太过局限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关现代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太少了。

1984年10月,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在准备论文答辩期间,读书的范围就更广泛一些了。当时,与我同寝室的符钢战同学(也是宋承先教授指导的我们同一届硕士研究生)也刚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他研究的是波兰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又译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卡莱斯基的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卡莱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推导出了类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且是具有动态性质的宏观经济理论,所以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非常推崇卡莱斯基,在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也吸收了许多卡莱斯基的经济思想。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者都因为受到了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影响,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加的影响。由于硕士论文研究内容的关联性,我和符钢战的交流自然就比较多一些,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我当时就去读了卡莱斯基《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增长理论》的英文影印本。

此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在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等待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搜集、阅读、整理了一些有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论文和国内研究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资料,开始着手撰写《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一文,这可以说是我独立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自主选题和独立撰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同年年底,我毕业分配到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花了近半年时间对文章初稿做了多次



修改,最终定稿后投给了《经济研究》编辑部。老实说,当时投稿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对文章的发表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在这之前,我在1984年曾经给《经济动态》投过一篇关于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理论述评的稿子,但很快就被编辑部退稿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编辑不久,我非常幸运地收到了《经济研究》编辑部的稿件外寄通知,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1985年第9期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的文章,而且是放在当期的第二篇文章,文章的标题用的是较粗的宋体字,代表着是这一期杂志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点类似现在的封面文章。所以,收到那一期的杂志真是无法形容,记得当时老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反复翻阅那本《经济研究》杂志。

1986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中国宏观

经济研讨会,由于我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关系问题,所以就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在论文被会议录用后,也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我遇到了《经济研究》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朱铁臻研究员,他最初看到我时,先是有惊讶地说:史晋川你这么年轻,难怪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不知道你。朱老师还对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在编辑部讨论时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能够发表不容易。虽然朱老师并没有具体地说有哪些不同的意见,但我同朱老师后来在会议期间随意聊天的感觉,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国内学者撰写的有关国民经济增长的文章,大多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及社会再生产公式为基础的,许多经济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刚刚接触不久,尤其是对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更是了解得比较少,不太熟悉。至于说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建立数理模型来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是更少了。此外,这篇论文的篇幅好像也太长了一点,总共有12000多字。现在想想也是,当年一期《经济研究》也就刊登10篇左右的文章,每期杂志的这种字篇幅大概也就是在每期的1/3。在这种情况下,要录用刊登一篇经济学界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写的长篇文章,对于《经济研究》的编委会和编辑部来说,确实可能是一件需要下点决心的事情。好在那是80年代,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的伟大改革年代!

《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以卡莱斯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及基本模型为基础,基于当时我国所采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物质平衡体系(MPS)的统计指标,构造一个包含了10个变量参数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总量模型。总量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

变量参数为三组,分别涉及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及积累基金中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消费倾向、储蓄与银行信贷,以及企业的折旧基金。当时我们国家的收入用途分配的原则,是直接调控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扣除积累基金后的国民收入才是分配给个人的消费基金,但消费基金中会有一部分被家庭或消费者个人储蓄起来,然后通过银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同时企业拥有的折旧基金也可以用于再生产。我当时所构造的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实际上也就是吸取了卡莱斯基和剑桥学派的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思想,把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储蓄率及相应的储蓄,分解成了由国家、个人、企业来决定的三个部分:积累基金、个人储蓄和企业折旧基金,在此基础上来进一步讨论国民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讨论,《经济研究》也专门发表了对于我这篇文章的评论及质疑,曾有针对不同观点的初步回复。十多年后,曾经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我当时所构建的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是“国内第一个吸收了西方经济学做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将这一模型作为国内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投资派”代表性模型。

回顾生涯30多年,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职业生活的起步阶段,《经济研究》对我们这些年轻学者巨大的信任和无私的支持,不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我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热情,而且已经成为我自己终身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不竭动力。

贺强教授入职中泓源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7月12日,中泓源集团在北京总部二十一世纪大厦举办了一场隆重而热烈的聘任仪式——集团副董事长宋仁龙宣布:正式聘任国内知名经济学家贺强先生担任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泓源集团总裁刘海波和特邀嘉宾《中国证券报》朱义军出席了聘任仪式。集团北京总部员工共同见证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中泓源集团副董事长宋仁龙对贺强教授加入中泓源大家庭表示热烈欢迎。宋仁龙强调,作为中国经济界、资本市场和金融界,贺强教授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仁龙指出,在当前严监管形势下,P2P平台连续暴雷,也波及到私募基金领域。此时贺强教授出任中泓源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意义重大,既是对中泓源集团的信任,也是对中泓源集团是央企控股企业的肯定。中泓源集团是央企控股企业,有着严

密的内控制度,健全的风控流程,管理线条清晰,进退有序,担负着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重任。贺强教授的加入,充实了中泓源集团的理论基础团队,使集团发展方向更加清晰明确,必将大大提升集团在战略规划、金融证券以及投资领域的综合研究实力,引领中泓源集团在资本市场走得更加久远。

贺强教授在聘任仪式上致辞。他首先对加入中泓源集团表示感谢和荣幸。他强调,中泓源集团在助力实体经济、贡献资本价值的同时,具有团队良好的治理结构、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以及团队协作精神,正是这些特质的吸引,促使他选择了中泓源,并希望在这一优秀平台上,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大家一同创造中泓源更加灿烂的明天。

贺强教授曾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当选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央财经大

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兼任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金融学院货币银行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翻看贺强教授的履历,各项荣誉和奖励不胜枚举,更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我国研究股份制的第一批专家;他历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政协代表中唯一专门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的专家;他创立了国内第一家证券期货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独立董事,同时,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见证人,也是北京第一批最老的发展。

谈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贺强认为,在资本市场研究方面应坚持三个宗旨:理论结合实际、宏观结合微观、国内结合国际。并注意经济周期、政策周期和股市周期的互动结合。他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虽然涨跌起伏,经历了风雨的考验,但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支持企业融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寄

语集团员工,希望大家多学习、多思考、多观察、多研究,无论何时都要保持钻研的作风。

宋仁龙在总结时表示,相信凭借贺教授在资本市场和金融证券领域丰富的经验、深入的洞察力以及业界广泛的影响力,将为集团跨越发展和开拓创新带来更大空间。同时,宋仁龙强调,贺强教授的到来,也开启了中泓源集团员工的求学之路,希望大家尽情展示智慧和才华,不断学习,追求进步,努力成为贺教授的学生。

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综合性投资集团,中泓源集团正逐步进入跨越发展的新阶段。集团始终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导向,努力构建“国际视野、民族产业、投融结合、多元发展”的新格局,实现经济发展、企业进步和投资者利益的多赢协调发展。配合业务板块的整合与迅速增长,中泓源集团在高端专业人才引进上也不遗余力。贺强教授受聘中泓源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将对集团强化内部投研、拓展外部渠道起到关键作用。这也是集团在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加强高管团队建设、引进一流精英人才的重要举措。

未来,中泓源将进一步发挥优势,依托资本市场力量,向成为“中国更具贡献力的价值投资典范”发展目标阔步前进。

▼ 链接

贺强,满族,中泓源集团首席经济学家,1952年9月生,无党派人士,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期货证券研究所所长,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原北京市政府参事,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宗禾)

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更严苛

■ 王孝松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直指中国进行了“不公平贸易”,其核心依据便是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从而造成了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并在几次谈判中要求中国进行“对等”的开放。实际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以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和捍卫者自居,却在高喊“公平”、“对等”的口号之下,实施了众多严酷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一些措施公然挑战WTO规则,一些措施则十分隐蔽却极具杀伤力。

本文对美国和中国的主要贸易保护措施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可以揭示出两国贸易保护各自的特征,并揭示出美国国内充斥着严酷、多样的贸易壁垒,其使用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非常明显。基于此,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存在对国内特定市场的保护,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如果美国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一味强调贸易伙伴在美国具有优势的领域扩大开放,便陷入了现代重商主义的泥潭,并逐步演化为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这是全球贸易发展的大敌,而且可能激化成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美国应客观地认清自身的贸易保护现状,在市场开放领域求同存异,以互惠为目标,同贸易伙伴展开友好而坦诚的对话来解决分歧,从而推动全球化进程和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中美关税比较

此次贸易争端,美国突出强调了汽车关税的不平等:中国小汽车进口关税为25%,而美国相同产品为2.5%。这种片面的比较无法揭示出两国关税水准的全貌,本文将中美两国的关税整体水准和高关税产品进行比较,

来考察对特定产品实施较高保护水准的做法是否仅在中国存在。

根据WTO统计,2017年,中国全部商品的简单平均关税率为9.9%,农产品关税率为15.5%,工业制成品关税率为9.0%;同年,美国的三种关税税率分别为3.5%、5.2%和3.2%。从整体关税水准来看,美国的税率较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严格履行了入世承诺,在入世后的十几年间,不断降低关税水准,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美国设置的各项产品的最高税率均高于中国,且极端高税率覆盖的产品比例也高于中国。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的平均保护水准低,但对特定的重点行业给予了特殊照顾,设置了非常高的关税壁垒。

进一步地,本文以美国指责的中国小汽车25%的关税水准为门槛,将中美两国的产品分为高税率产品。可以发现,中国设置的高税率率为65%,仅覆盖少量农产品,覆盖产品的种类占全部产品的万分之2.2。中国超过50%关税税率的产品主要是小烟叶等农产品以及磷酸二胺等化工原料。关税高于25%的产品中,只有部分内燃机、电视和资讯技术产品、汽车为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其他均为农产品或工艺简单的工业制成品。当然,对汽车等产品施以高关税,反映了中国政府扶植重要产业发展的目标,但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这种保护是合理的,特别是目前已将汽车等相关产品的关税税率降至15%,更表明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诚意。

实际上,以关税进行产业保护在美国也广泛存在,甚至美国在特定领域对关税的使用力度要大于中国。美国征收的最高税率达

到了350%,主要集中于烟草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对部分药品、部分纺织原料、部分贵金属等征收的关税税率超过100%,覆盖产品种类达到了万分之5;美国对大部分纺织品和服装征收高关税,从30%至100%不等。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小汽车关税率为2.5%,但拖拉机的进口关税率为27.5%,而汽车空调、声控信号装置等零部件的税率高达35%,汽车用钢板及弹簧、汽车照明设备、发动机的税率为25%。可见,美国市场并非其宣扬的那样开放,其针对汽车行业上的保护集中于上游零部件领域,从源头上对外国产品进行限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总体上看,中国征收25%及以上关税税率的产品比例为0.48%,而美国为万分之3.31%,可见美国高关税覆盖的产品更多。只是由于美国将大量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以及通过进口获取低廉价格的产品设置为0关税,才使其整体税率偏低。

二、中美非关税措施比较

WTO及其前身GATT的基本宗旨是倡导贸易自由化,其组织召开的多轮谈判使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准显著下降。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更加重视非关税壁垒,旨在通过一系列针对全部成员或特定贸易伙伴的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市场。

我们对中国入世之后中美两国使用的非关税措施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针对全部WTO成员的措施中,卫生及植物检验检疫(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以及特殊保障措施,美国的发起数和执行数都远大于中国。数量限制的发起数大于中国,执行数小于中国;而保障措施的使用量两国都很少。

针对双边的措施中,由于美国是反倾销、反补贴的传统使用国,而中国使用这两种措施的历史较短,所以美国的发起数和执行数均远高于中国。在SPS的使用中,由于美国是众多技术标准制定者,所以其发起的案件很多,也有部分案件导致了最终的限制措施;反观中国,发起和执行的案件数目都只有两起。

进一步地,从两国相互使用的非关税措施来看,美国对中国发起和执行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数远大于中国对美国发起的数量。而且中国还未曾用SPS对美国产品进行进口限制。反倾销等非关税措施往往导致很高的进口附加税,因而杀伤力极强,同时这些措施又是WTO规则所允许的,是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但往往能形成十分隐蔽的贸易壁垒。

三、结论

通过从WTO官方网站获取中美两国贸易壁垒的原始数据,并进行简单的整理与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美国贸易保护具有严酷性、隐蔽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其在倡导自由贸易、公平贸易的同时,对特定产品的国内市场施以严格的保护。美国标榜的“捍卫自由贸易”仅在贸易活动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条件下才会成为现实;其指责中国的“开放度低”、“开放度不对等”的问题在其自身也明显存在。

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准显著低于中国,免税产品比例也高于中国,但其对特定产品征收超过300%的极端高额关税,而且税率高于25%的产品覆盖率远高于中国。特别地,美国汽车产业的关税水准并不低,其在指责中国时只对小汽车一类产品的关税水准进行了中

美比较,而“忽视”了拖拉机、发动机等重要汽车产品和零部件。

在关税保护作用日渐式微的背景下,美国是非关税壁垒的重要使用者,其使用反倾销、反补贴、TBT、SPS等措施对WTO全体成员施加了数以千计的贸易壁垒,直接限制了众多贸易伙伴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特别地,中国入世以来,美国使用反倾销等措施严酷打压中国相关产品,呈现出发起量大、实施率高、打击面广等特征。

从本质上说,贸易保护措施确实具有限制他国产品、保护本国市场的作用。古往今来,只有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施行了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其他时期,任何经济体都会或多或少地设置贸易壁垒,从而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中国不例外,美国也不例外。甚至美国政府为扶植国内相关产业,会作出直接违背WTO规则的最新审议报告。美国仍然对棉花、糖类农产品进行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增强这些产品的竞争力,而WTO明令禁止生产及出口补贴等严重扭曲的政策措施。可见,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敢于采取各种措施。当众多WTO成员对美国的补贴行为忍无可忍却又无法改变现状时,各成员也纷纷对本国产业采取了保护措施,既有报复美国的意图,也有“效仿”美国的含义。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因此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拥护者,也是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未来将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断降低贸易壁垒,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